

跨越千年时空的奇文：《陈时政疏》

□ 丁万明

数百年的国祚，主要原因是“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心”。从魏晋到隋代，昙花一现的王朝也不胜枚举，原因是“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”。所以，君主的为政举措如果有不当之处，就很可能要面对“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”的局面。马周直言：“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”，所以，对自身要有节俭的要求，同时对下属和百姓要广布恩泽。他还以史为证，认为是“文景之治”的俭朴之风为西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倘若足穷兵黷武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继位，“天下必不能全”。接下来，马周直接指出时弊：过重和过繁的徭役已经让老百姓难以承受，造成民怨沸腾，但权贵们却招摇跋扈，奢靡挥霍。马周直接批评道：“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犹如此。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后，圣虑之所当忧也。”

其二，延续上一段结尾的话题，劝告李世民“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唯在百姓苦乐”。这里表达了马周的重要观点：国家理所当然要广有贮积，但贮积的规模大小要与当时的民力相均衡。在民众未得到纾困、大势未苏的关键时刻，国家如果仍不知民众疾苦，一味囤积财富，甚至强征捐税，反而可能导致资寇。隋朝的前车之鉴不得不查：隋朝建了洛口仓，大量囤积粮食，又在洛阳大量囤积布帛，结果祸乱一起，洛口仓的粮食被李密据为己有，洛阳囤积的布帛便宜了王世充。这段史实应该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。马周认为，“凡修政教，当修之于可修之时，若事变一起，而后悔之，则无益也”。所以为政者的见微知著、及早思变是达到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。

其三，请李世民事务要“俭以息人”，以“俭”养诸王之德。《陈时政疏》反复强调“俭以息人”，强调放纵奢侈会导致更多贪欲：有地位的人、贪欲旺盛的人，就会走上歧途，贪赃受贿，招致可怕的祸患；没有地位的人不能控制贪欲，就会觊觎、盗窃他人财物，导致败家丧身。因此“奢侈是罪中之罪”。而杜绝的良方就是“俭”。“俭”不仅关系到人的品德，更关系到事业的成败。马周提醒唐太宗吸取历史教训，“动人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”劝诫李世民马上思变，立刻对“俭以息人”付诸行动，切勿对诸王“溺于私爱”，而是“预为节制”。马周认为，皇帝之子本就生于富贵，养尊处优，如果还对他们厚于宠溺，他们定会变本加厉地骄奢淫逸，危害社稷，遗祸后世。

其四，《陈时政疏》提出“天下者以人为本”的重要观点。行文的笔锋再次直指时弊，认为朝廷对很多临时官员的选拔非常草率，比如刺史就得用武人，很多人是因为在京城干得不好，就把他们外放，做得越差，外放地越边远，导致那些边远地区的刺史、县令素质低下，地方治政乱七八糟，而那些“以德行见称擢者，十不能一”。所以百姓未安，始由于此”。这是当时一个严峻的现实，马周不仅看到了，而且敢于秉笔直书，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解决办法：“致化之道，在于求贤审官；为政之基，在于扬清激浊。”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从来不是小事，如果想让民众安居乐业，就一定要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：“治天下者，以人为本。欲令百姓安乐，唯在刺史、县令。县令既众，不可皆贤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则合境苏息；天下刺史悉称圣意，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，百姓不虑不安。”后世顾炎武对这个观点很是赞同：“人主苟欲亲民，必先亲牧民之官，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。”

具体到《陈时政疏》这篇文章，之所以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认同，且流传久远，是因为该文直抒己见，不事虚饰，讲清了四个重要观点。

其一，该文劝导唐太宗为政要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。李世民是杰出的帝王，然而也多欲多求，很容易导致刻薄寡恩。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无疑是对症下药的良方。马周以史为鉴，对历史大势有着深谋远虑，他回顾夏、商及两汉之所以有这延绵

人类有了文明也就有了文字和书籍，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，其“刚健日新”的特征与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之收藏、整理、流传息息相关，故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谈到藏书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藏书的主体：藏书家。他们不仅专注于书籍的搜集保管，而且潜心藏书事业。明代学者、诗人胡应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嗜书如命,倾囊致书

胡应麟（1551—1602年），字元瑞，号少室山人，浙江兰溪城北隅人。幼能诗，万历四年中举，自言于他无所嗜，唯嗜好古籍，“饥以当食，渴以当饮……忧藉以释，忿藉以平，病藉以起色”。他的藏书爱好深受家庭影响，其外祖父宋震建雪溪堂只为万卷书，父亲胡僖自幼好学，乃嘉靖三十八年进士，亦有不少藏书。胡应麟自十二岁跟随父亲游历各地时，便十分关注当地的古书市场。每当遇心仪之书，他就忧心忡忡、坐立不安，一旦持归，便手舞足蹈，见到“上世之藏，帐中之秘”更是不舍昼夜，亲手抄录。胡应麟回忆藏书经历时有言：“余为童子至今，年日益壮而嗜日益笃，书日益富，家日益贫。”他可谓是竭尽一生只为“穷搜委巷，广乞名流，录之故家，求诸绝域”。故其收藏富赡，越中诸世家无人能匹敌，《金华诗录》云：“婺州藏书，独盛于兰溪。”

然而，为了“典籍之好”，胡应麟也是煞费苦心。《五杂俎》记载，明代浙江虞守愚侍郎家中藏书万卷，更是为了万卷之书建造了藏书楼于水池中央，平日仅仅依靠一块木板通过，到了夜晚便将木板撤走防止有人私自借入，门口还写着“楼不延客，书不借人”。然而虞氏子孙却没有继承虞守愚的遗风，玩物丧志，导致虞氏家族家道中落，没有财力守住藏书楼。胡应麟倾慕虞家藏书楼已久，购买了虞家的万卷藏书，他也因此以“书海”之美誉闻名海内。

当然，胡应麟的求书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，他也常常与醉心的

典籍失之交臂。他十分心喜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的《柯山集》，苏轼就曾称赞张耒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。但胡应麟只收藏了《柯山集》的十三卷，故怅然若失。恰巧一日，他在杭州一处偏僻的巷子中见到了《柯山集》钞本书一十六帙，尽管书纸半已湮灭，但是文集印记奇古、装饰都雅，且比自己所藏多不啻五六倍。胡应麟欣喜若狂，奈何身无分文，便与卖家约定第二天早晨相见，以绿罗二匹以及身上所穿的乌丝直裰青蜀锦衣袍交换那部《柯山集》。于是，胡应麟返回家中筹集钱财，一心等待第二日的到来，搔首踟蹰、夜不能寐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将此书铺烧了个精光，一切化为灰烬，他为此摇头叹息了数月之久。

二酉山房,藏书为用

胡应麟毕其一生，四处搜罗典籍，“所购经史子集，其世自洪荒以至昭代，其梓自吴越以至燕闽”。待他20多岁与母亲宋宜人离京都返回浙江兰溪时，已然“宦橐亡铢铢，而余妇簪珥亦罄尽，独载所得书数十篋，累累出长安”。据《二酉山房记》所载：胡应麟所藏之书合计四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卷。为了安置如此数量浩瀚的文献古籍，胡应麟特地在家乡建造了一所藏书楼，且为缅怀秦朝学者二酉山洞藏书之功德，故他将藏书楼命名为“二酉山房”。当然，受财力所困，胡应麟囤书也并非包罗万象，他所藏之书大致分为五类：一是家中未藏之书可收；二是考虑经济情况，购买价格较低版本的书籍；三是异书收藏；四是手抄友人的珍本、善本、秘本；五是不购买价格昂贵的古遗墨法帖。

胡应麟的收藏不局限于典籍的堆积，他能藏更能用，这是以往藏书家所不能及的。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谢肇淛曾评析道：好藏书之人有三大弊病：一是贪图虚名，一味装潢炫耀，实为买椟还珠；二是四方收罗却束之高阁，徒洗浣灰尘；三是慧根短浅，能倒背如流却不能运用，丧失书的益智功能。胡应麟认为第一种人即是“好事之人”，第

二种人即是“雅尚”，第三种人即是“鉴赏家”。

对于第一种人，他提出了“书之为用”的原则，在他看来，藏书只有使用和阅读才会发挥它的作用，如果仅仅以“藏”冠名，书就会名存实亡。他认为：“夫书好而聚，聚而必散，势也。”无论人们怎样呕心沥血地搜集典籍，可是书籍终归会散失，所以他极赞成书籍流通，即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”。据史料记载，胡应麟特别重视与朋友之间进行交换刊刻、共游书市、无偿赠书等交流活动。

鉴于第二种人，胡应麟认为要勤于读书，“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，即所聚穷天下书，犹亡聚也。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，即所读穷天下书，犹亡读也”。这从胡应麟家里的陈设可见一斑，“入余室者，梁柱、椽桷、墙壁皆无一见，湘竹榻一，不设帷帐，簟、几、一几、一博山、一蒲团”。无怪乎王世贞调侃胡应麟是用买书的余钱来建造书房的。

至于第三种人，胡应麟认为读书与治学本是相辅相成的，并无矛盾，正如他所说：“博洽必资记诵，记诵必藉诗书。”人们需要广涉博采，通过大量读书充实自己，拓宽眼界，但学问不仅要“博”还要“精”，即用心思考，“必须尽见当时事理，如身履其间，丝分缕解，终始备尽”，方可“置议论”。陈文烛就赞扬胡应麟“有博学而不穷，笃行而不倦，幽居而不淫，上通而不困”。

潜心治学,著述等身

二酉山房丰硕的藏书、优越的地理环境也为胡应麟读书治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万历十六年，也就是胡应麟38岁之际，他已撰写了不少作品，其可考的达49种1036卷，成书存世的有16种211卷，还有未成书的数百卷。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，十分欣赏胡应麟的才华，赞其“馨叶时读书几与身等，今学无不窥，浸浸有雄视百代意”，而后更是直言要让他来当自己的接班人，“后我而作者，其在此子矣夫”。

胡应麟“读书等身”“学无不窥”，内容庞杂，要而言之，主要表现在文献学、史学、文学研究三个方面。在文献学方面，胡应麟用力颇深，他长于考据，《经籍会通》四卷“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”，征引典籍极为宏富；尤善辨伪，《四部正讹》考辨遍及四部，系统总结了“辨伪八法”；精通目录之学，总结历代史志，由宏入微，提出“五部”图书分类法。

在史学方面，胡应麟“少而好史，占毕之暇”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，时人更以“良史”赞誉。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史书的编纂、历史文献的整理，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。如对于具备“史才”“史学”“史识”即是史家的观点，他认为尚未足也，更要有“公心”“直笔”，这是从“史德”标准作出自己的阐发，扩展了史家标准理论深度与广度，也为清代章学诚形成“史才四长”的观点提供了丰厚的学理基础。

在文学研究方面，胡应麟擅长诗论与小说研究。其诗论集中体现在《诗数》一书，全书广征博引，语言古雅，可谓珠玑满纸。他在《诗数》中全面评价了《诗经》至明朝两千余年的诗歌发展脉络，纤悉无遗，点评鞭辟入里，多发前人未发之论。如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埋没百年，无人问津，直至胡应麟的《诗数》问世，才令沧海遗珠的《春江花月夜》一跃成为“孤篇盖全唐”之诗。除了诗歌评论，他对小说研究亦相当重视，其研究涉及小说的作者、成书、版本、人物塑造、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，更是最早利用目录学的成果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系统分类，他对于古代小说的许多评论常为后世学者征引、称道，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就曾引用胡应麟对小说的论断。



马援的《诫兄子严敦书》

□ 吉炳伟

改正背后讥笑和议论别人的习惯。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”我希望你们听说了别人的过失，像听见了父母的名字，耳朵可以听见，但嘴里不可以议论。喜欢议论别人的长处和短处，胡乱评论朝廷的法度，这些都是我最深恶痛绝的，我宁可死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有这种行为。

信中言语没有以高高在上的长辈自居，以“汝曹”称子侄，真情亲情跃然纸上，一下拉近了长辈和侄子的距离，更能收到耳提面命的效果。信中对“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”表示深恶痛绝，“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”。反复强调议论人容易招来是非，容易被别人当枪使，因此听听就可以了，不要瞎掺和。在这里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说得明明白白，既措辞严厉，又语重心长，使人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。

这封信的可贵之处，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晚辈沟通，用了二位现任官员的作为得失加以分析品评，一位是龙伯高，天下龙姓的先祖，东汉贤良之臣。另一位是杜季良，也是东汉非同寻常的人物。信中说：“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，吾爱之

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，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”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，说出的话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，谦约节俭，待人又不失威严，我爱护他，敬重他，希望你们向他学习。杜季良这个人豪侠好义，有正义感，把别人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，把别人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，无论什么人都结交。他的父亲去世时，来了很多人，我爱护他，敬重他，但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。至于为什么学龙伯高，不学杜季良，又进一步解释：“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‘刻鹄不成尚类鹜’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者也。迄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效也。”因为学习龙伯高不成功，还可以成为谨慎谦虚的人，这就是所谓的雕刻天鹅不成，还可以类似于鸭子。而一旦学习杜季良不成功，那你们就成了纨绔子弟，就是所谓的画虎不成反成狗了。到现在杜季良还不知晓，都将到任就令人怨恨，百姓的意见很大，我常常为他寒心，这就是我不希望子孙向他学习的原因了。在这里，学什么样的人，不学什么样的人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既爱憎分明，又讲清道

理，使人明辨是非，学有目标。

信中谆谆告诫晚辈“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”是做人的大忌，要他们勤谨、节俭、诚恳、谦逊，不要成为轻浮的人，这是他观察社会人生得来的经验之谈。光武帝刘秀看到马援这封信后，很是欣赏，提升龙伯高为零陵太守，杜季良则因为仇人告其行为轻浮，乱群惑众被罢官，可见马援看人是很准的。马援的教导是成功的，马严、马敦都学有所成，马严不再痴迷于击剑、骑马和射箭，转而专心于典籍，阅读名家著述，并与德才杰出人物往来，马严的儿子马融还成为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。“刻鹄不成尚类鹜”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也成为传世名言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马援的女儿10岁就能操持家务，马援死后，她年仅13岁就被选进皇宫侍候太子，后来成为著名的马皇后。她善于处理官中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生活俭朴，对娘家人要求极高，多次拒绝皇帝给她娘家人封侯的提议，是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做到母仪天下的人，这些都与马援的严格家教有关。

